

1900 A. D. ~ 1994 A. D.

20世紀中國全紀錄

Chronicle of China - 20th Century

20世紀 中 全紀錄



Chronicle of China – 20th Century

主編 廣州市文化傳播事務所
執行主編 吳少秋 陳方遠

北嶽文藝出版社



20世紀中國全紀錄

主編：廣州市文化傳播事務所

執行主編：吳少秋 陳方遠

出版：北嶽文藝出版社

（中國太原解放路 46 號樓）

規格：889×1194mm 16K 84.5 印張

經銷：廣東省新華書店

印刷：香港新國勤印刷公司

版次：199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5376-1373-6 / 1 · 1351 定價：398 元

凡例

一、“全紀錄”為中國傳統的《春秋》修史體例與現代新聞報道體裁的結合，即循年、月之順序，對規定範圍內之史料擇要抉精進行編年體式的載錄，形成縱嚮編排；而對每一被輯入之歷史事件，則藉新聞報道的多種表現形式進行處理，完成橫嚮表現。經此處理，較大程度地降低了陳年史料的枯燥度與隔膜感，增加敘述的活力、事件的新鮮感及閱讀的可親近性，調節版面節奏，強化對比效果，從而賦予讀物以多種角度的可讀性。

二、本書正文載錄之歷史事件時間上限為1900年1月，下限為1994年6月。收入事件的發生時間一般準確到“日”，少數難以詳考日期之事件，則祇準確到“月”（在“大事記”中，“本月”以△符號代替），極個別概括性的史料祇準確到“年”。收入對象的限定為：發生在中國領土（包括臺灣、香港及澳門）上的重要人事活動與自然現象；涉及華僑及保留中國籍的旅外人士之重大事件；與中國的重大政治、經濟、文化與民生事件直接關聯的外國人事。外籍華人之特別事迹，則酌情在“大事記”中加以反映。

三、本書版面主要由4種表現形式構成，其中有（參見右下圖所示）：

1. 報道 本書的主要版面形式。以新聞報道體裁對歷史事件進行較完整的介紹、敘述。報道中常配有插圖，插圖一般附有注解文字（若插圖內容與報道內容明顯同一時，則免去注解文字）。報道設有大小不等3級標題，根據報道內容的重要性而定。

2. 大事記 本書的另一主要版面形式。逐日將該月份發生的重大、特別或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加以集中，簡括臚列。“大事記”所收事條原則上不與“報道”之條目重複，但有少數與“報道”之條目中之一細部重複，以示強調。

3. 圖片報道 本書的輔助版面形式。以歷史照片或圖畫為主、文字為輔，共同合成於同一圖框之內，自成單元，獨立報道事件。

4. 花邊報道 本書的另一輔助版面形式。體裁類似“報道”，區別為所收內容多係“軟性史料”，即意義較為次要而主要以趣味性見長之事件或統計性史料，新聞特色不明顯。收入“花邊報道”中的，尚有少數內容係出自“野史”式的傳說，其歷史的真實依據在於“曾經傳說”，而非“曾經發生”。

四、為方便海內外的傳播與交流，本書特地採用繁體漢字印刷，但其中極個別用字考慮到時間進化的事實與“約定俗成”的原則，作了簡繁混排的嘗試。

五、本書凡表示數量之數字，一律採用阿拉伯數字；凡表示序列的數字，基本採用漢字；而專門用以表示時間序列（年、月、日、時、分等）和部分表示文章段落層次序列之數字，則依照普遍習慣，採用阿拉伯數字。

六、凡本書涉及之人名，一律直接稱呼或加職稱，而不附帶尊稱。



主編序

對於本書的主編者來說，有一種雙重的幸運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是我們恰好活在一個不論對人類抑或對中國都無比重要的世紀里，其次是這個決定性的世紀如今正在我們的直接視野中走向終結。作為世紀末的參與者、觀察家與繼承人，我們佔有着前祇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優越地位，保存着親歷的猶新記憶，據此得以對百年流程中的中國面貌作最近距離的審視，從容載錄。

對中國而言，沒有任何一個世紀的意義可以媲美於 20 世紀——這當然是一種不公平的比較，因為 20 世紀本身是建築在其他一切世紀之上的世紀——迄今為止一切中國事件的最新高潮之所在。不過，撇開 20 世紀各種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透過 20 世紀中國人所創造的夢想、業績、革命、爭戰、發明、動亂、奇迹、災變……在這百年舞臺上所有悲喜劇情節之後，一種本世紀獨有的特徵已足以說明本世紀中國歷史之重要了。這就是：有史以來，中華民族從未耗費過如此漫長的時間，用以從滅頂的生存危機中自我拯救，用以重建尊嚴和自信心；同樣地，從來沒有過哪一個時代的中國人，會像 20 世紀的中國人這樣明確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是如此重要，而且這種重要首先是因為自己地位的改善和命運的轉折而決定的；同樣地，也沒有哪一個時代的中國人，能以如此廣泛地意識到歷史是他們所能參與創造的。

中國人有輝煌久遠的歷史。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歷史觀。中國人也有朝代的自豪感，但問題是自豪感不等於歷史感，不等於對命運的關切和把握。在強盛的王朝里，中國人深以自己身為帝國的臣民而自豪。人們頌揚自己所處的時代，頌揚帝王的英明、衙門的清廉、谷物的豐足、道路的平靜……中國歷史上更不乏黑暗年頭，但黑暗同輝煌一樣，並未孕育中國歷史的質變。20 世紀之前中國的苦難，要么導致等待的麻木，要么導致幻化的回憶，要么導致破壞的釋放。即使改朝換代，歷史的故事也不過又是從頭開始。封建王朝中時間的鐘擺不管以什么方式抖動，最終還是回到原來的位置去。與這種重複的量變的歷史進程相吻合，我們在 20 世紀之前的中國史籍中，可以找到對各種事件的不厭其煩的記敘，可以找到激烈的贊美和譴責，却難以找到對民族命運嬗變規律的探討和根本變革的企望。即便是在最偉大的歷史著作中，作者興趣所在也還是事件本身，而非事件背後的命運密碼；關切的總是王者的業績，而非整個族類的進化。人們朝某個時代的榮光歡呼，却似乎不曾為某個時代的重要涵義——因為根本就沒有重要涵義——而激動。同樣地，人們承受時代的輝映，却不覺得自己也可以是時代的光子。在一個長久封閉的農業帝國中，歷史進程—民族命運似乎總是自然而然地被領會為草木式的榮枯輪轉，世道盛衰如果不是歲時運行般的注定循環，那麼便是天意，宿命而無從解答。

但是，來到 20 世紀，事情發生了絕大變化。19 世紀西方入侵者給中國帶來的苦難同時使中國歷史出現了質變的契機。

在世界業已發現中國之後的大半個世紀中，中國一直在殫精竭力地拒絕發現世界。在這個因非理性而被格外延長了的歷史進程中，帝國耗盡了它的精力和能量，其代價和邏輯的結果便是專制漸漸崩喪、平民意識普遍蘇醒、傳統知識分子轉型、中國被迫徹底對外開放並帶來觀察方式的變化以及對世界文明的認同。正是這些，促使本世紀的中國歷史以及中國人的歷史觀產生了巨變。連綿貫穿於本世紀的一個進步事實便是：洞穿中華民族的命運，解脫中華民族的苦難，探索中華民族的出路，逐漸深入中國平民階層的意識之中，日益成為大眾化的普遍使命。以歷史的眼光來看，17世紀或者18世紀末的中國民衆腦袋里裝的東西與19世紀末民衆腦袋里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不同，然而20世紀末的中國民衆的意識和思維，却顯然迥異於百年之前。

20世紀的中國歷史帷幕是由暴風驟雨的義和團運動揭開的，因而義和團運動也自然成為本書的起點。而當我們再次面對相當熟悉的史料時，我們卻發覺，發生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可能是一個比我們慣常所理解的要遠為複雜的現象。這場由中國最沒文化的農民階層發起的大面積暴力風潮，甚至可被視為20世紀中國政治歷史的索引。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之間的整整60年間，列強一再縱情掠奪中國領土和銀元，恣意羞辱中國的尊嚴，民族生存危機之嚴重已無以復加。腐敗無能的清王朝與它的官僚們輪番淺嘗了武力抗爭、討好列強、製造兵器、發展實業與變法維新等救國藥方，却毫無例外地失敗得一塌糊塗。貴族、官僚與知識份子都一籌莫展，無奈與空白之中，拯救民族的重任似乎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本來就承受着最深重災難的下層民衆身上，於是就有了義和團。義和團現象的複雜在於：它一方面表明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已經到了空前極限，一方面又更加深化了這一危機，而在這一切的背後，它又的確促使中國問題出現了某種轉機。顯然，企圖由毫無現代知識與世界概念的農民來拯救國家，注定是破壞性和悲劇性的。事實上，以咒語、拳術和刀矛為武器的義和團運動，僅僅是一場民族讐恨的空前宣泄而已，其結果却是八國聯軍掃蕩北京的浩劫。不過，這場短暫的“拳亂”却為20世紀的中國社會留下許多矛盾的伏筆。它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中國農民已經被導入20世紀的歷史舞臺，它不僅企圖填補救國格局中的空白，甚至還盲目地追求充當主角——這是一種完全迥異於以往封閉國度中“農民起義”式的政治介入。而不管這一介入導致了多少危險的結果，它却是20世紀中國政治平民化的決定性開端。同樣地，這場以毀鐵路、斷電線、痛殺一切洋人為目標的狂飆運動也預示着以後中國民衆運動中普遍存在的“雙面刃”特徵：既傷害敵人，又傷害自己，合理的民族衝動中往往釋放着對現代文明的反動。

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再到義和團，一系列的失敗，為中國人 19 世紀式的救國之道打上了休止符，迫使 20 世紀的中國新人充分承認世界的存在，並且把眼光投向中國之外。既然膚淺地實用主義地摹仿西方與使用傳統的中國方法都無從解決民族危機，那麼，救國的道路祇能深入到中國以外的廣闊空間去重新尋找。義和團運動後的大規模出洋求學潮，便成了 20 世紀中國歷史轉機的一個重要注腳。

從另一個角度看，義和團失敗的貢獻莫過於宣告了舊式民族生存觀念的終結。中國歷史中，每當外敵入侵，民族生存出現危機之時，朝廷、國家與民族總是三位一體的概念。保衛國家政權即等於保衛民族生命。義和團本能地實踐了這一觀念。參加讎洋暴動的北方農民自發地修改了他們原本的反清讎滿態度，與他們並不熱愛的慈禧太后結盟，以保衛沒落的清王朝為己任。魯莽的農民與昏庸的官方的這一危險搭檔很快便以前者被後者徹底出賣而作結。義和團的失敗，促使民間對政府的最後幻想完全破滅，人們開始相信：推翻一個政權，變換一種政體，可能比保衛一套現成的國家機器更是解決民族生存危機的出路。革命的概念借助義和團的失敗而獲得合理性。儘管發動辛亥革命的不少先驅人物對義和團運動持激烈的否定態度，但我們仍然無法否認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

換言之，以偏激、盲動和愚魯為特徵的義和團運動，在一個失去激動的時代再造了激動，並以其破壞性的後果轉化為 20 世紀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革命、平民參與政治、非英雄史觀以及對世界文明認同等決定性變化的催化劑。與義和團的失敗感同時彌漫開來的，其實是普遍的革命觀念，是更換政體，重造歷史的民衆政治否定意識。

每一個需要處理史料的人都必定會遇上“公正”的難題，這尤其表現在對史料的篩選和史實的復述上。儘管在行文敘述時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恪守不褒不貶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則，但在對史料的選擇上，我們却無法回避價值觀念的判斷。20 世紀的中國歷史畢竟是如此的波瀾壯闊，多姿多采，汗牛充棟，而貫穿於其間的黨派政見之爭又是一直佔據主導地位，且是如此尖銳激烈而莫衷一是。將佔人類 $1/4$ 人口的百年史濃縮於一冊書上，大規模的取舍存棄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公正，同時也為了體現我們對 20 世紀中國歷史獨特重要性的理解，本書對史料的取舍力求擺脫意識形態觀念，而循民族生態的演化、民族生存危機的解決進程、政治行為與歷史觀念的平民化及對世界文明的認同這一綜合主線而進行。換言之，20 世紀的中國史——在我們看來——首先是一個連續的“救國”與“民族自強”過程。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或文化的紛爭，均可以還原為民族生存的努力。但願這冊由不見經傳的人物編纂的《20 世紀中國全紀錄》能以使中國讀者稍多地了解自己國家的命運以及希望之所在。

20世紀伊始，世界向我們展示了這麼一幅分裂的多元場景：歐洲人在巴黎舉辦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奢華的博覽會，用以炫耀歐洲文明的中心地位與殖民主義的成果；非洲的戰事正如火如荼，土生荷蘭裔白人與英國皇家軍隊為爭奪誘人的德蘭士瓦大金礦混戰不已；在美洲，美國人繼波士頓地下交通系統的成功之後，着手興建紐約地下鐵路；大洋洲的澳大利亞上，拓殖活動的迅速發展正在導致聯邦制國家的籌建；而在古老亞洲的中國，却爆發了“殺洋滅教”的農民大暴動：成群結隊的農夫從鄉村涌出，手持短棍長矛，剿殺洋人，向一切帝國主義面孔宣戰……

整整一個世紀就要過去了。不管我們的民族在這百年之中承受多么驚人的苦難、羞辱和劫波，我們畢竟已經擺脫了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機。為了印證和了解中國之外的世界，為了自立自強於這個世界上的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又付出了百年的魔難和光陰。如果中國真像拿破崙說的是一頭東方睡獅的話，那麼睡獅的確已經醒來，但願它能完全舔乾自己身上的血污，再次恢復偉大的精力，進入全新的21世紀。

1900年，歐洲人以他們的巴黎博覽會揭開了人類的新紀元；

2000年，人類又將以奧林匹克運動盛會慶祝新世紀的降臨；

1900年，中國人在北京圍攻列強的使館，最後一次企圖將世界逐出門戶之外；

2000年，中國人希望在北京舉辦新世紀奧運會，以期讓中國更加徹底地走向世界。

但是，1900年發兵攻打中國首都的那些國家，大多拒絕了中國的願望。

那麼中國怎麼辦？

毫無疑問，中國將因此而追求變得更加强大，將更加堅定地走向世界文明，並且將在新的一個世紀中謀求對世界文明作出支配性的貢獻。

也許我們可以設想，既然歐洲人可以不經別人投票就徑自舉辦了1900年巴黎博覽會，那麼，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自己舉辦一個2000年北京博覽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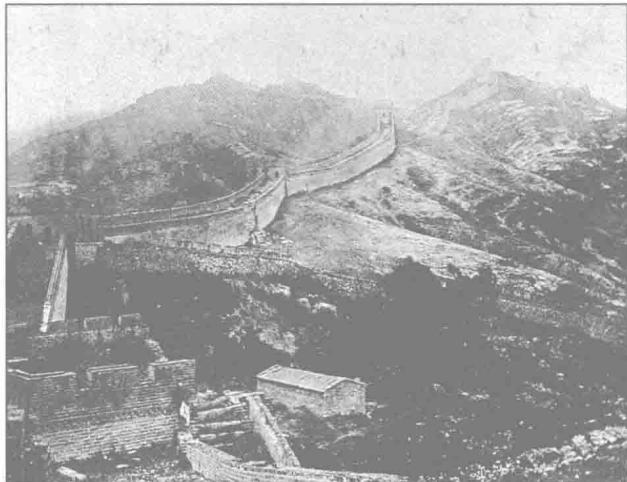
如果一個2000年北京博覽會的籌辦真的能够成為《20世紀中國全紀錄》的結尾，那會是一個再美好不過的結尾。



1900 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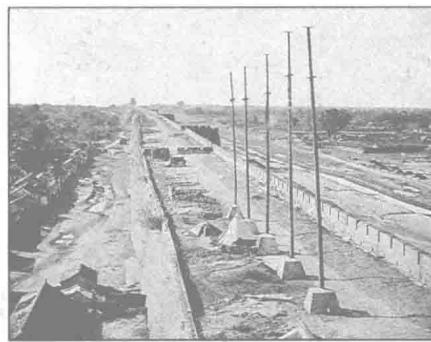
廿世紀前夕的中國



19世紀70年代末，一個西方攝影家鏡頭下的破敗長城：它已絕非一道國防學意義上的屏障，而祇是一堵旅游學意義上的磚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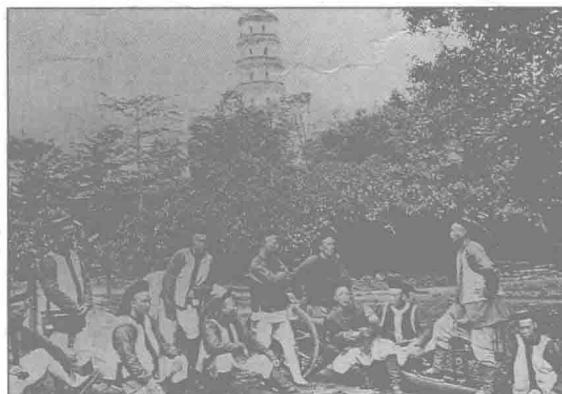


即使中國的城牆依然堅固，而看守着它的卻是這樣一些軍人的話，在兵利甲堅的來敵面前，又有什麼是他們能夠捍衛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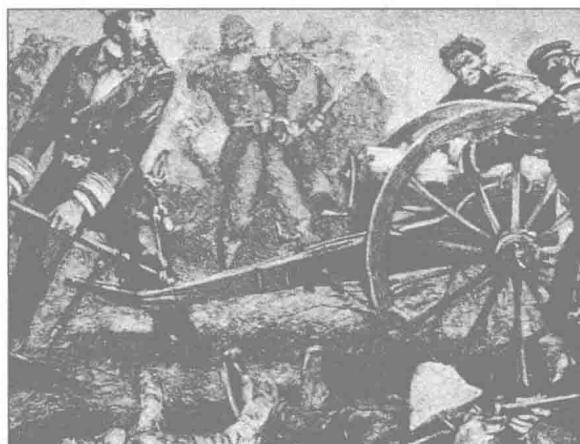
正是在此之前，一支規模不大的洋人軍隊，輕易越過清王朝的國防屏障，直抵帝國首都，並在安定門城牆上搭設營帳（下圖）。

為了羞辱倉皇逃走的中國皇帝，當年長驅直抵長城腳下的英法聯軍，縱火焚掠了皇家心愛的圓明園（上圖），留下了“中國不設防”的千年印記。



一個失去長城的中國

來自蒙古的驍勇將軍僧格林沁指揮着草原的射手和其他英勇戰士，試圖守住京師大門渤海灣。但是他失敗了。乘着鋼鐵炮艦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發動者順利攻佔了大沽炮臺。



列強發起一場進入“失去長城的中國”的空前競賽——俄國人搶佔烏蘇里江以東（左上圖）、法國人攻打鎮南關（右上圖）、日本人登陸山東半島（下圖）

.....



廿世紀前夕的中國

伴隨必不可少的燈紅酒綠，吸食鴉片仍然是晚清官員的重要嗜好。



國已不國的世紀末景象並未破壞慈禧太后歡慶 60 歲生日（左上圖）的興致，也不妨礙醇親王（右圖）之類的王公貴族繼續玩物歡娛，或者影響紫禁城裏太監們的奢華享受（左下圖）。

充斥各種衙門的昏官冗員依舊沉溺於虛張聲勢的官家排場（右下圖）、權貴間的禮儀遊戲（右上圖）以及更為殘酷苛嚴的吏治（左圖）之中。





本以保疆衛士為天職的軍人們，而今卻以耀武揚威地押解賠償外敵的銀子為能事。



這是發表於 1898 年 7 月《倫敦畫報新聞》上的圖畫。在英國人看來，當他們宣佈強力租借威海衛時，清廷的官員們表情竟然是如此安詳，甚至略帶愉悅，這令洋人也吃驚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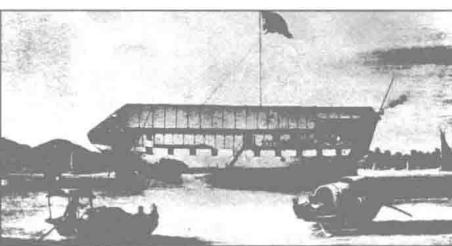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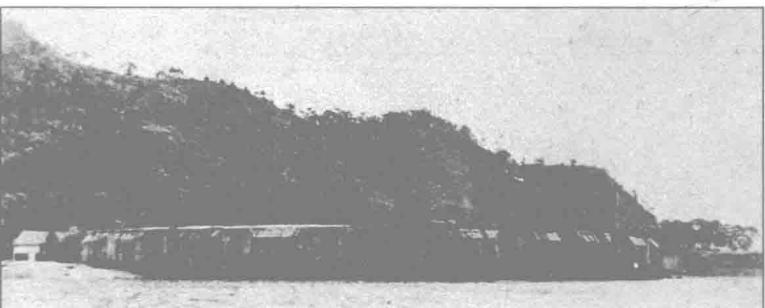
官家昏瞞，民眾麻木。政府張貼在街頭上的賣國告示（左上圖）與胡同里的民間小雜耍（左下圖）一樣吸引着悠閑的北京居民，讓他們感到有趣。吸食之風彌漫於城鄉（右下圖），而賭博之風益盛（右上圖）。

個昏迷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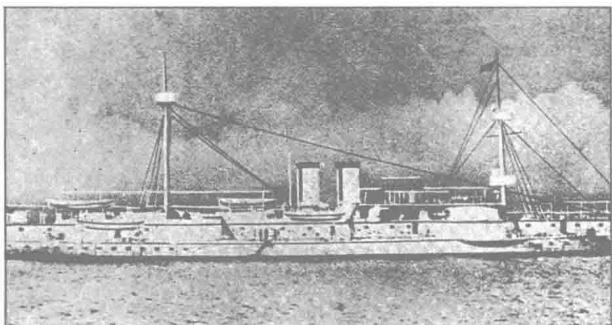
廿世紀前夕的中國

滿清王朝同樣是一個古怪的自絕於海洋的王朝，在統治中國的數百年間，它一直努力自我封鎖海疆，嚴禁民衆下海出洋。漫長的海岸線，祇靠一些孤立的炮臺進行嚇唬式的鎮守（上圖）。

而偶爾也游弋於淺海區的官府木船，則連這些偷運鴉片的躉船（下圖）也抵制不了。祇有當臺灣島一再受到侵犯後，清廷纏花整整 7 個月時間來討論該不該創設一支水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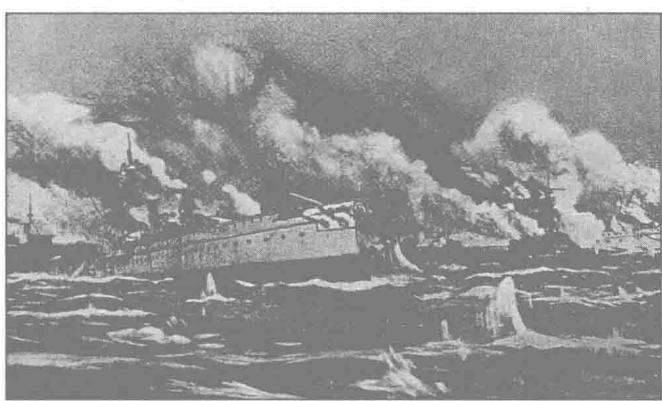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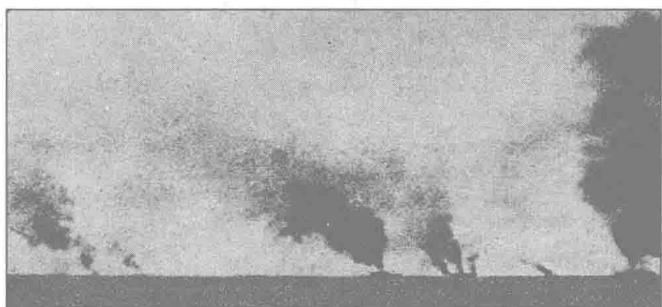
1885 年海軍衙門正式成立前夕，清朝的海上力量卻遭到空前摧毀。1984 年 8 月，法國艦隊進攻臺灣基隆受挫後闖入閩江口，與中國福建水師同泊馬尾（圖左）。懦弱的清政府害怕傷害和氣竟未加制止。8 月 23 日，法國艦隊突然開火，福建水師倉促應戰（圖右），結果沉艦 11 艘，傷亡 700 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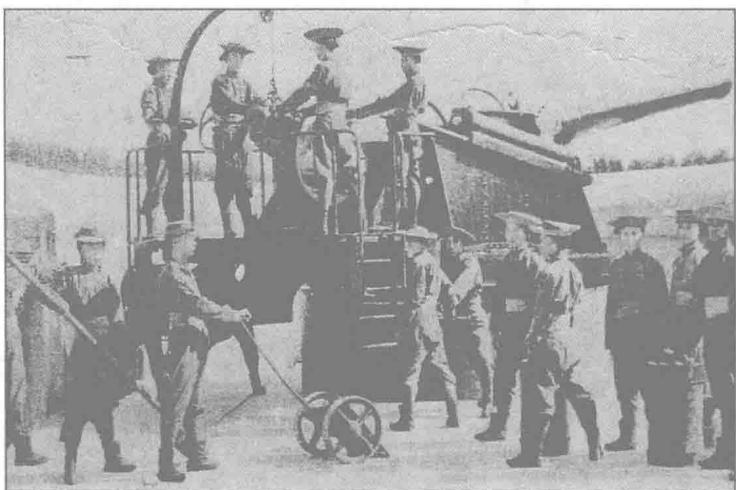
1888 年，北洋海軍正式組成（下圖），擁有巨型戰艦“鎮遠”號（右上圖），“定遠”號和巡洋艦 8 艘、炮艦 6 艸、輔助艦 6 艸，規模稱雄遠東。但最具悲劇性的卻是，北洋海軍成立之時也就是其鼎盛之頂，此後它便停止擴展，3 年後更連槍炮彈藥也不買了——因為海軍的主要經費都被慈禧太后拿去修建頤和園（左上圖）。



一個在海上徹底失敗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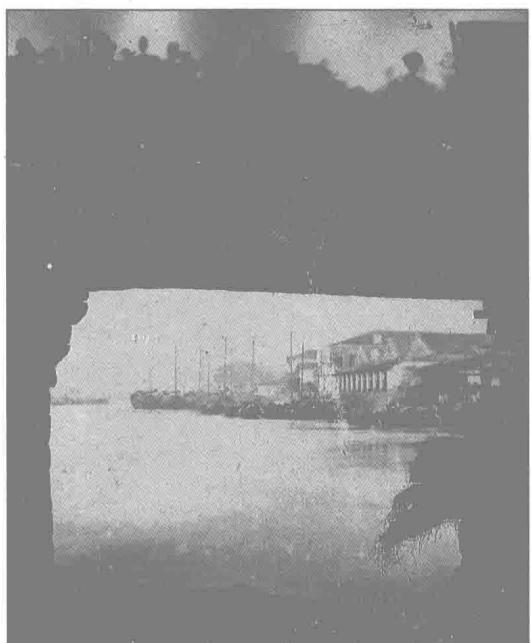


就在清王朝又一次表現出驚人的荒唐時，隔海相望的日本卻以北洋艦隊為假設敵，日以繼夜趕製軍艦，於甲午之年（1894）連續兩次重創北洋海軍（右上圖），致使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右下、左上圖），指揮官丁汝昌（左下圖）自殺。



失去了海軍的中國，最直觀的結局便是將臺灣拱手相讓予日本（上圖）。在海上徹底失敗了的清王朝，祇好又一次縮退到岸上來“保衛祖國”了（下圖）。

廿世紀前夕的中國



當歐洲遠征軍在長城的一邊焚掠中國首都時，長城另一邊的居庸關的中國農戶人家，一樣沉浸在祖輩相傳的祥和晨光之中。

